



中国外交研究丛书

中国外交新高地

HIGH LAND OVER CHINA FOREIGN AFFAIRS

王逸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外交新高地

HIGH LAND OVER CHINA FOREIGN AFFAIRS

王逸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外交新高地 / 王逸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004-7372-5

I. 中… II. 王… III. 外交—研究—中国 IV. 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2208 号

责任编辑 冯 斌
责任校对 韩 聪
封面设计 部落艺族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祖国！

——作者

自序

书写完了，该向读者做些交代。静静想想，分几个方面陈述如下。

一

对于中国外交的研究者，2008年是一个值得记录和思索的时刻。

这一年本来应是中国的喜庆之年、上新台阶之年：始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进程，进入了一个丰硕的收获季节；人们在缅怀它的推动者之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在思索前行的方向和新的任务，满怀信心地积蓄更大的能量、取得更大的进步。这一年的北京奥运会，既是国际体育界4年一度的盛会，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展示自己的进步与善意的良机。中国自近代以来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盛世，中国百姓也从未见过如此的盛会。准备工作已有一段时间了，上上下下都憋足了劲。何况这一年年底，好似锦上添花，还有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召开，几十个国家领导人的到来，将促进中国与国际间的合作，也令中国民众自豪。

然而，大喜似乎注定有大悲伴随。原本想象特别吉祥的这一年，却有格外多的天灾人祸。年初那场几十年罕见的大雪灾，偏偏发生在对寒冷缺少物质和心理准备的中国南方，摧枯拉朽般地毁坏大范围的林木、道路、房屋和输电线路的同时，也减弱了中国传统第一大节春节特有的喜庆团圆气氛。3月中旬“两会”期间发生在西藏和其他一些省、自治区的少数僧侣和藏民打砸抢烧事件，以其事发之突然，程度之严重，让国人惊愕，让世界震动；此后一段时间西方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歪曲、渲染，尤其是围绕北京奥运火炬在世界各地传递过程出现的各种抗议示威，

委实让中国广大民众伤心、愤怒与不解。最不能不提的，是“5·12”汶川大地震，这是建国以来影响范围最广的一场地震灾难，是给当代中国人造成史无前例的视觉和心理冲击的自然灾害。在天灾人祸之外，这一年的中国还受到全球经济低迷衰退阴影的笼罩：从外部环境观察，一个时期国际油价暴涨，美元汇率持续走低的同时，各国股市大跌，物价飞涨；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并逐渐连累到其他经济体；中国进出口贸易受到深刻冲击，中国股市由盛而衰地急剧下跌，中国物价的上涨幅度已是多年罕见。国外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攀升导致国内企业和消费者面临一系列麻烦。如同温家宝总理指出，2008年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多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众所周知，他在灾区视察时写下了“多难兴邦”的板书。

重温30年的变革历程和细辨今日的各种争论，让人懂得中国这一代人走过了国外可能须几代人经历的变化。每每感受到那些迫切希望办好奥运会、当好东道主的真挚情感，让人知道中国有多么善良而好客的人民；尤其是看到电视上抗震救灾的大量报道，灾区人所受的苦难和表现出的勇气、子弟兵的生死救援和政府领导人的民本作风、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的气概与效能，还有以往少见的媒体新风、志愿者行为和公民良知，不只让人感动落泪和心灵震撼，更看到了伟大祖国的远大前景。作为当代中国外交的一名研究者，笔者想讨论的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满怀信心走向新时代的中国人，如何像面对地震、雪灾和各种危难时表现的那样坚韧顽强、互爱互助，朝着文明大国民、风范大国民的方向挺进；如何以新的形象昭示世人并用制度和规范保障这种形象的延续，使最高领导层表现的爱民作风落实到外交工作“以人为本”的实践中；如何使我们的对外交往（包括理论研究）面对各种危机时仍能镇定自若、有理有利有节，把中国民间在奥运期间充分表现的自信、善良与好客，转化为我们对邻国、对周边地区、对国际社会更有普遍性的承诺与帮助，减少和化解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如何恰如其分地反省前段“西藏动乱”及“火炬风波”折射出来的媒体管理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教训，扩展、加强整个抗震救灾过程国内外新闻机构表现出来的积极性与重要启示，让我们外宣工作更加实在、更加真实、更有说服力；如何让我们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大政方针的制定过程既反映出领导层的智慧和魄力，

又能深刻折射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和日益成熟的公众意愿，让后者有更大的知情权和参与机会。

还有一点。这次大灾之后，很多人欣喜地感受到，我们的年轻一代并非想象的那么自私，我们的社会还深藏着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基因与线索，我们的政府领导人和子弟兵有那么可亲可爱可尊可敬的一面。即便在市场化的今天，人性比很多人想象得更伟大、更美好，社会比一般的理解更丰富、更有延展性。这也是大悲之后的另一种大喜，是特殊条件下特殊观察后的特殊发现。由此，也可以联想到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认识。其实，国际政治并非只有所谓的“丛林法则”，国际社会也包含许多感人的因素，它们夹杂在博弈、自助、阴谋和战乱的表象下，关键是人们有没有信心和愿望去理解它们，以及怎么去观察它们、如何发掘它们、用什么方式扩展它们。何况在不同的国际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国际政治的特点以及国际社会的形态又有很多不同与变化，分析和解释这些不同与变化，需要更大的努力。笔者在书里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刻画国际关系的这一面，也是想呈现与平日多数人印象不太一样的那些东西，让读者对未来、对外部更有信心，懂得中国外交的进步并非“一枝独秀”，更不是孤立无援。

汶川地震发生时，书稿已近完成。之后的一段时间，写作断断续续。笔者抑制住泪水和情感，尽量用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分析态度与文字，记下感受到的启迪，期望祖国大地发生的悲喜，在笔者的作品里能留下些许印痕。

二

本书推进的一个目标，是分析有关中国的不同理解与解释，把它作为外交工作及其研究者必须直面的一项挑战。

说到现实的中国，我们自己的人往往想的是与发达国家的颇大差距，是中国在全球排名百位之后的人均 GDP，是国内处处可见、触目惊心的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紧缺、法制缺位、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等，总而言之是看自己的问题多，看得仔细、真切，的的确确把自己国家看

成一个仍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外界的质疑和批评，国人倾向于要么认为它们源自阻止中国强大的不可告人企图，要么是不了解中国实情所致，要么起因于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偏见；对外部质疑和批评的所有这些判断，都含有“真理的颗粒”，但都不能取得完全的国内共识，或者成为主导政策制定的唯一考虑，总之是造成了外交之国内基础的复杂性、多样性及与外部主流理解的巨大反差。这是一个曾经有强盛的古代文明、近代遭受外部侵略和严重失败、当代几经曲折最终获得短期快速发展的中国必然具有的复杂心态和自我定位。身为中国人，作为一个专业研究人员，笔者经常感到解释自己国家日新月异变化的难度，深深为之而困惑；国家太大了、变化太快了，而自己作为国际理论和人文科学的后来者，掌握的工具又太缺乏、学术的积淀太不够。笔者相信，这种感受也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多数中国的媒体工作者、教育界人士和科研人员，及至最高层的外交官、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总体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中国国民心态，也将是很长时间内中国外交的社会心理背景。

往另一面观察，国外的人（包括那些专业人士）多半谈论的是中国的规模和总量、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庞大而不透明的”军事现代化过程、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明基因、让很多外国公众不懂且担忧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总之是对现有的、处于主流位置的国际体制和公众意识的“异类”和“他者”性质，是一个与他们已熟知的美式超级大国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超级大国。在很多外部观察家眼里，用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尺度衡量，中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其崛起是不争的事实；13亿人口不断增大的需求一方面在拉动（或者“在拯救”）颓势频现的美国经济、西方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在吞噬很多国家的资源与机会；从历史经验判断，中国人眼下面临的麻烦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肯定会用西方民主体制下无法想象和匹敌的方式克服危机，让人畏惧的“中国龙”的腾飞，必将带来全球能源、环境、资本、市场、投资、贸易、就业、军力、国际制度、力量中心等等的改组和震荡。外部世界的人想象的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中国、神秘色彩丰富的东方国度，而多数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构思的当代中国，比较而言，更像是可畏但不可亲、充满不确定性的“共产党

大国”。不论在其他方面这种外部性有多大的优点与理性成分，但凡涉及当代中国，不利的想象就会浮现。这是一个充满幻觉、偏见和局限性的想象，是外部真实的存在和大范围、主流的设置，是中国外交不能不长期交往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公众必须学会“适应”的舆论空间。

作为一个有机会经常出去的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者，笔者熟悉自己的祖国，亲历了各方面的变化，知道取得的进展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不易，同时也了解外国说法的复杂性及多重性，知道它们由何而来，还会怎样演变。说实话，这中间的反差之明显、深刻，弥补它们的不可能性，非我们的公众和官员所能想象（中国的外交官大概是最了解这种理解差异的一个群体），也让笔者作为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理论工作者深感压力和不安。客观充分地、不带偏见地解释这种反差，让中国公众和新闻媒体深刻了解它的存在，是一件极端必要但又极其艰难的工作。道理上，它需要首先辨认外部某些阴暗险恶的策划，判定正常的国际政治博弈，识别真正的人类历史进步，同时看到自己国家的优势、变革、弱点与毛病，把对外交往的言行与内政的某些动向联系起来分析，用说理的方式而非打架的姿态澄清该做的事情和不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来说明中外不同思路的原因与高下。它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在书里，笔者不奢望自己能做出很多新的、有力的解释，也不敢想取得多么大的认同，所尽力做到的，仅仅是凭研究者的良心和知识办事，说出认真分析后的发现，让读者和受众感知中外解释的反差，体会个中的复杂与混沌，懂得中国“融入”世界的不易，知晓与他者沟通的紧要。笔者宁肯相信，这是中国外交取得新进步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外交学迈上新台阶的一步。

三

上面已涉及本书的主题，即“新高地上的中国外交”。这里再说几句，算是一种题解。

在笔者看来，恰似而立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当下的中国外交也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地上：这是一个视野远比过去开阔、风景看上去

“大美”的位置，但与此同时“高处不胜寒”，很容易感受到过去不可能感受的压力、危险与挑战；若想站稳脚根、享受美景，必须踏在更加宽大而坚实的基石上，借助合适的外套、工具与视角。

所谓“新高地”，指的是中国今天和未来一段时期在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不断上升的位置，这种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意愿，不是我们想不想、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而是国际国内的大势使然，是新阶段中国国家利益发展的需要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之间互动的必然结果。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利益，海外部分比例将越来越大，中国人必须走出去，新的地段、新的空间拓展和实现这种利益。而这种实现的过程，按照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中国人的理想，应当是在合作中推进，在共赢方式中获得，在与外部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中深化，即我们常说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理念。但正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外部世界对中国理念和步骤的了解甚少，消极的推测和质疑居多，从而必然出现我们看来阻力大于合力的麻烦局面。享受美景绝不是没有代价的，很可能代价的高昂超出我们的预期，甚至超出很多中国人的理解与承受能力。如果我们不想退缩，回到原先的位置，不仅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也要学会说服别人接纳中国的崛起与大国地位，并且用行动证明和教育他者相信，中国的发展壮大不是世界之祸而是世界之福。书里用前三章（“30年的进展”，“形成中的特色”和“拓展新的空间”）的篇幅论证，经过30年的培养与锻造，中国外交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与转型，形成许多独特、重要和富于生命力的特质，中国外交人初步具备了适应新阶段压力的观念与能力，只要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就一定能再上台阶、登高望远。相对后面两大板块而言，这一部分是比较严格意义的外交研究，是对充满新气象的当代中国新外交的认真解读与更大期待。

笔者认为，站在新高地上的中国外交，一定要有好心态与新的立足点，尤其是学会细致、客观、虚心地观察外部世界可为我用的地方，区分国际体系中霸道成分和王道因素，懂得“二战”后（包括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演化的规律、特征及中间包含的进步性，洞察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善恶交织的画面，择善固执且从善如流，不要为少数霸权国家当政者的恶劣言行所干扰，不被国际政治消极

的东西所诱导。中国是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我们是世界上进步最快、实力增强最显著的国家之一，只要自己保持好的发展态势，任何外部麻烦和危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国本、威胁中国的生存。与很多弱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的命运只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有了这种信心，再观察和对待国际社会，我们的外交与战略就会变得从容不迫，更有借鉴力和同化力。沿着这个逻辑，笔者把讨论延展至对环境和他者的看待，并且用了“新景观”的篇题。如果说上篇“新高地”的三章，主要讨论的是我们自己外交体制和观念的改革、发展、进步的话，那么中篇“新景观”包含的另外三章，着重分析的是“借鉴”的一面，即分别看国际关系是如何进步的（主要是对当代国际关系多半不为人言的光明面和积极因素的发掘），世界体系是如何演变的（重点是研究当下国际政治复杂性、矛盾性和严峻性的一面），西方同行是如何捉摸扑朔迷离的大局的（对欧美一些战略名家或思想闻论的解析和评点）。读者很容易发现，这里面，既有防范、制衡的竭力，又有学习、借用的讲究。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文明古国，中国人应当善用他山之石，这一点放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更不言而喻。

下篇“新平台”，着重研讨更大范围的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问题，笔者把它们作为在新时期实现中国外交跃进的某种思想准备。“传统安全的新议程”一章，讲中国国际和军事现代化面对的新使命，不过，它并非沿着纯军事的、技术性的角度纵深推进，而是依国际关系研究者通常遵循的路径前行，即把中国传统安全目标（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的实现，置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国内背景，置入中国承诺“和平发展”、推动“和谐世界”理念的互动过程，置入复杂多变、霸道王道并存的国际大环境，在这样三种放置的动态画面下加以观察、设计和推进。除开领土纠纷、台湾问题、大国军事对抗的可能性等老的考量之外，新阶段海外利益的拓展、海上通道的安全、对国际社会的安全义务与承诺等，得到更大的重视与探究。“非传统安全的认知”一章，则试图另辟蹊径，侧重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类似“非典”、“金融危机”、严重传染病和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安全后果与社会震荡，研究不同动员过程和体制机制（包括军队等强力部门）的效果与利弊，揭示应对各种非预警性重大威胁的新思路新办法。书中指出：非传统安全问

题的研究，实质上是对安全领域的一种“非传统探索”。它在承认传统安全研究某些有效性的同时，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以往安全分析过程的缺失与偏颇。非传统安全强化了安全问题上的社会关注，它要求保持对国内政治发展进程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密切追踪，承认和看重国内社会的进步性，以此作为实现社会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的前提。“它以解决中国现实面临的许多新型安全难题为切入点，承认并正视现有体制的不成熟不完善，在深入分析和力图消解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大力倡导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对于中国的国际战略设计而言，它展示了新的思考天地；对于中国外交而言，它预示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转型。总之，非传统安全的这种视角，体现出中国和平崛起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社会基础，不仅有助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亦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与此衔接，最后一章“国际法中的启迪”，以中华民族作为当代国际体系后来者的身份定位，瞄准了更久远的未来，提示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法制国家，遵守进步的国际法律体系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景。笔者判断是比较乐观的：近几十年全球法律领域的进展，启示着、带动了中国的司法进步，尽管当代国际法中仍大量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现象；中国巨人在法制领域的前进，又将推动整个人类关系的更加公正与合理，不论全球法治进程是多么艰难、漫长。

四

在笔者看来，受改革开放精神洗礼，中国学界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不应是充满匠气的机械工作或唯上唯书的对策讨论，而要成为有思想性、有问题意识、有批判精神、有各种情趣的探索。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者，在学会把脉世界大势、应对复杂外部挑战、精通各种博弈手段的同时，要有勇气承认中国自身存在的不足，有智慧和能力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相关的差距，并以此作为深化理论、升华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风范大国形象，主要不是争抢到的，而是“修炼”来的，即通过改造、增强、完善自身而逐渐形成的。这是统

领全书、贯彻始终的一个思想，也是自己保持思想韧性的指南。

这里的一层意思，是防止头脑僵化。笔者喜欢与年轻朋友在一起讨论问题，也常常提醒自己，要努力保持探索刀锋的锐利，像青年一样富有好奇心和追问态度。这是有感而言，带着针对性的。身在大的国家科研机构 20 多年，见证了许多的人与事，其中当然不乏值得肯定和令人兴奋之处，但同时感受弥漫四处的机关官僚作风和唯上唯书陋习。说实话，这些东西让自己深恶痛绝、极不舒服。笔者亲眼见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胸怀大志、才华横溢、思想奇特的同学，由于各种原因的作用，变得谨小慎微、口味庸俗和思想迟钝。笔者害怕自己也变成那样，也知道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考虑清楚了长期存在、非一己之力能够改变的特定环境，笔者要求自己向宝刀不老的师长学习，向善于创新的同龄人学习，向迅速崛起的青年学习，从心理上、思想上乃至体能上做“本世纪的同时代人”。

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审视意识，绝不人云亦云，被不理解的东西牵着走。在社会科学领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个中原因读者都能想象。笔者经常叮嘱自己，身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禀赋是具备独立的人格，保持与研究对象的审视与距离，落在纸面上的东西要不违反自己的良知，哪怕为此而不能取悦某些人，即便为之付出这样那样的代价。在中国，研究国际问题，要特别注意避免陷入技术性细节和故纸堆里，或只把目光盯住外国的事情，一味追求“斗”与“诈”的技巧，而不关心本国的发展动向，不会解说自身体制的“长”与“短”。这些年，笔者在不同的地方反复强调一个看法：中国外交的转型与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不可分的，后者是新阶段中国外交的国内基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各种因素之“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决定着中国对外话语权的含金量和国际形象的光彩度。与很多中小国家和弱势民族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是规模这么大、历史又如此悠久的一个国家，本身就像一个独立而庞杂的文明体系，内部的整合过程、发展动力和文化基因起着决定作用（不管向好向坏）。当代中国发展和壮大的主要动力，不是他人赐予的或任何国际体系强加的，不是纯粹外部客观环境激发的产物，而是来源于本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植根于适合时代特点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更新和社会进步。

同理，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威胁，不是外部的某个霸主或某些反华势力，而是来自内部发展的停滞及失序；外在的恶只有在内部消极成分累积到危险程度时，才会升温为突发的、首要的毁灭力。通俗地讲，“苍蝇只叮有缝的臭蛋”。因此，爱国的方式并不只有赞美歌颂，贬抑和夸大属于不同程度的伤害，都是要不得的；实事求是地看待我们的长与短，扬其利、去其弊，也是一种对祖国母亲的呵护。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故步自封、恪守教条是没出息的，改革开放才是新形势下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他用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的方式，证明他与这两位伟人一样，是中国近代以来贡献最大、最了不起的爱国者。笔者相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仍将处在邓小平时代，体制上的除旧布新仍将是“中国词曲”的主调。依据这样的判断，笔者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一个既有别于“策士”，又非书斋文人的专业研究人员；一个深爱祖国母亲，又有真切全球关怀的国际问题专家；一个既富有真诚合作意识，又具备审视批判精神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笔者也深信，唯此定位，才能使自己的研究事业充满乐趣和想象空间，才能使自己在学术道路上走得远、走得久，才能使自己的学术观点及建言赢得尊重和影响。

五

还想探究一下思想和心灵深处。

首先想对十多年前写作《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时表达的看法做些补充。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是这样说的：“在考察国际政治时，应当有什么样的立足点？不知这对别人算不算一个问题，至少对笔者来说，经常为此困惑。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透过人生的‘万花筒’，你可以发现（领悟？）在现今的时代，你对外部世界了解得越多，见到得越多你原先有所不知而别人独具慧眼的见解，或者发现自以为知其实不知的某些地方，你就越不敢下独断、做结论；尤其对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通常你的专业就决定了你对人类具有的共同问题——如生态保护、人口

增长、军备竞赛、种族歧视、文化差异等——有更多的了解和忧患，你可能因此而很少做出一副‘唯我族类’的俨然，相反，总希望自己成为或起码看上去像是一个能够避免狭隘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通常这就有了某种‘国际主义者’的成分）。另外，不论你如何对外部的东西开放、明理和宽容，你毕竟是特定国家特殊民族的一员，你脱离不开生你养你的土壤和文化，你的父母妻儿在你的祖国用你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语言文字和习俗方式与你生活和交谈，你熟悉这种语言，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中国的传统强调‘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士林风骨，更使你在研究中时时受到‘不忘国家和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提醒和（有时的）自责。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和不可回避，以至于笔者认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看待你研究的对象和提出建议，是当一个古道热肠的‘体制中人’还是客观淡泊的‘第三者’，真真是一个‘首要问题’。无论别人怎么说‘并不矛盾’，‘可以辩证统一’，笔者却常常为此而自扰，并且多半不能释怀”；“作为一个学者，是稳坐书斋、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客观描述’世界风云，还是主动参与、积极为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言？笔者看对很多人都存在一个抉择问题。其复杂和困难的地方还在于，有的时候，当你看到你曾经赋予期望的事情让人失望时，比如说最发达最‘国际化’的国家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行使毫无道义的霸权或谋取褊狭短小的私利，你可能会对常常坚信不疑的‘共同利益’闪过一丝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加重了‘民族一员’的意识分量。或者，当你的同胞你的国家表现出老也斩不断的劣根性和与人类进步格格不入的东西时，你可能在恨铁不成钢的同时，对外部世界的某些体制、风习和追求增加钦羡之情。笔者不知道如何说明自己的取向，但必须承认在这些方面有些问题尚未梳理明白。”^①

笔者必须承认，上述难题并未完全消解，工作中仍不时受到它或隐或现的冲击。但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思考的深入，自己有更加清晰的想法与解说。心目中越来越明确的是：要学会同时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欣赏其他国家的长处，民族的和世界的好东西是相通的，尽管它们有不同的表现；真正的智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是可以让它们和谐共容的，最好的状态

^①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写在前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是“多元一体”。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精辟概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哲学价值观的视角，具有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重大现实和理论意义，可以深入发掘、广为应用。笔者希望它成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当二者发生矛盾时，比如民族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之间产生摩擦，笔者的抉择很清楚：民族国家的利益仍然是优先的、对外部的各种关怀和支持，只能在本国生存、发展和不断进步的前提下加以推进。外部力量限制、遏止中国正常成长的图谋和做法，不仅将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也将削弱后者融入世界、充当建设性角色的能力与意愿。因此，首先需要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壮大进程不致中断，中国融入世界的积极进程能够持续，中国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前景才是可期的。这种想法与传统权力政治观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在承认民族和国家利益优先性的同时，看重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轨迹与全球范围的进步和人类共同体的福利之间的内在联系，努力促成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有矛盾的时候不是简单粗暴地将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更不能采取“只扫各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笔者在本书多个地方提示：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不能仅仅专注于博弈、格斗、争锋的各种技巧，只讲斗争性的一面，忽略不同行为体彼此间重大关切的兼顾，在形势波动时便忘记对“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理念的承诺。给定国家、民族、全球利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笔者的理论也设立了形似轮辐的内外层次及满足次序：首先，最内层的需求及利益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安全和主权，要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其次，才是周边区域、本地区更大范围乃至向外延伸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最后，是全面承担全球性责任，但它不是简单的线性扩展，而是多元利益的动态平衡过程，是同时包含着本国利益和国际义务、安全需求与经济需求、优先次序与兼顾眼光多个“对子”的复杂系统方程式，各种关系之间的调整不能偏废性倾斜，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态，而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外部条件的不断改变、经常修正的事业，调校的过程是漫长曲折的。实现动态均衡的过程，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它对世界、对人类的更大关注。

再来说说“全球主义国际关系”观念。

近年来, 在一些作品中, 笔者把自己称为“有全球主义关怀的现实主义者”, 或“有现实感的自由主义者”, 或“探求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者”。不过, 这种贴标签式的办法不太准确, 容易把人的思想空间变得窄小, 无法表达内心中复杂多变的真实界面。笔者同样明白, 理论永远不可能像实际生活那样多彩生动, 学术工作往往是对描述对象的比较简明、便捷的说法而已, 因而对它们并不太在意。重要的不是标签, 而是标签下面的东西。什么是全球主义? 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 什么是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 为什么自己有志从事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 笔者的解释大体如下: 首先, 全球主义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 它在强调个人、团体、民族、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全球村”的某种责任的同时, 也强调对各种行为体之复杂的、经常冲突的各种利益的统筹; 平衡不同利益的出发点, 是“共同体”的意识。它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 同时意识到全球化进程的多重后果, 主张趋利避害、共同发展。其次, 全球主义强调国际关系“进步”的重要性, 这种进步不止包括“发展”、“环保”、“援助”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 更有“改善”、“进化”、“提升”等概念包纳的深刻内涵。本质上, 全球主义的哲学观和世界观, 将人类历史视为一种曲折的演化过程, 而绝非单纯的循环。因此, 全球主义反对简单地用过去推断未来, 拒绝将现实政治的逻辑无限度引申。第三, 全球主义主张改革、渐进、对话和合作的路线, 一般说来, 它不赞成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激进的、暴力的或强制的手段。不过, 与和平主义者有所不同, 全球主义有分寸地赞成划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全球主义看重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价值, 坚决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 制定并尊重法制, 是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核心要求之一。第四, 全球主义有意识地挑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边界, 努力建立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积极互动, 鼓励使用“全球政治”的新型理念取代对“国家间政治”的狭窄界说。在全球主义思考框架下, 国际关系的进步和国家自身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国家的主权性、安全性和国家利益实现, 与它的社会进步性和国家开放性成正比关系。第五, 全球主义以人为本, 珍视个人的各种权利和自由, 反对随意用虚幻的、整体的存在, 简单粗暴地压倒个体的声音。全球社会思考范式的成立, 恰恰以个人自由的充分考量